

【高质量发展】

帕尔玛比值研究进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价值

苏京春 张 焱

摘 要：既有收入差距测度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本文从这一局限性出发，分析帕尔玛比值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相关局限性的有效补充作用。国内外相关研究新进展，以及国际组织、代表性经济体、研究型数据库的实践应用表明，帕尔玛比值为国别收入差距分析提供结构性视角，为全球洲际收入不平等的度量与研究提供支撑，且有助于弥补某一经济体内部收入差距统计测度指标的不足。最后，本文提出从完整五等分、十等分基础数据入手，进一步优化并构建我国帕尔玛比值测算模型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帕尔玛比值；收入差距；收入分配

作者简介：苏京春，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142）；张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DOI 编码：10.19941/j.cnki.CN31-1957/F.2025.05.006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至高质量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相关政策要求及改革举措愈发精准聚焦，更加注重提高收入分配的两个比重，并强调增收减负。党的二十大强调，“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①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②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国务院公报2025年第9号）强调，“以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③其中“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涉及的“就业支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农民增收”等“提低”政策，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落实得更为具体和聚焦。从宏观视角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消费提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需要持续优化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从微观个体视角看，提升幸福感、获得感和公平感，也对优化收入分配提出了迫切要求。

学界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层面：一是关注过程，包括从宏观层面分析国民可支配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之间的分配比重，以及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②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25年3月13日，第1版。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国政府网2025年3月16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3/content_7013808.htm。

第三次分配的视角进行观察；二是注重结果，利用有效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观察经济体或经济区域的最终结果表现，以判断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还是橄榄型，为政策调节提供参考。后者学术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基尼系数测算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并应用于因果分析，如林毅夫等通过测算 1978—1995 年各省基尼系数并按产业和地区对人均基尼系数进行拆解，剖析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区域收入差距的来源，^①再如李实和赵人伟基于 1988 年、1995 年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包括基尼系数在内的多项指标，以测算分析收入差距；^②利用恩格尔系数及其变形测算贫困程度、城乡收入差距等，如张立军和湛泳使用城乡恩格尔系数和农村恩格尔系数证明金融发展能够降低相应的贫困程度，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③再如曾国安和胡晶晶分别计算 1978—2006 年的城市、乡村恩格尔系数，以二者之差反映收入差距在生活水平上的体现；^④基于五等分和十等分比值，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 P90/P10、P90/P50、P50/P10（P90、P50、P10 分别代表收入分布中第 90、50、10 百分位的收入水平）系列十等分比值，以测算我国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⑤然而，就目前广泛使用的传统既定指标来看，其多具有总量特征和普遍适用特征，而并不擅长反映结构性问题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态表现。因此，可以说这些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更不论将社会结构、代际流动、行为影响因子、存量和流量视角等一并纳入收入差距成因考量体系内了。

国际上的通用指标基尼系数，在统计学层面对收入分布中间部分变化更为敏感，而对收入分布两端的变化反而不够敏感，更利于反映总量表现而非结构性表现，从而在实际应用中会对一些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产生低估，并且对动态变化也相对不敏感。而常用的十等分比值（P90/P10、P90/P50、P50/P10）、五等分比值（S80/S20，其中 S80 和 S20 分别代表收入最高 20% 人群和最低 20% 人群的收入份额）作为结构性收入差距指标通常能够更好地反映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尤其在测度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差距或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差距时，更加关注底层 10% 或 20% 人口的收入份额，这与发达国家收入分布情况更相适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出现了“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现象，是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极化，是否出现了底部人群收入分配占比持续缩小现象等问题，都对经济的继续增长以及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正是基于相似初衷，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Palma 开展了一项研究，提出用“收入位于前 10% 者的收入份额与收入位于后 40% 者

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1998 年第 6 期，第 5—12 页。

② 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5—19 页。

③ 张立军、湛泳：《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分析及其检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 年第 12 期，第 73—81 页。

④ 曾国安、胡晶晶：《论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经济评论》2008 年第 1 期，第 45—54 页。

⑤ 刘一伟、汪润泉：《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居民贫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 年第 9 期，第 75—92 页；申云、贾晋：《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经验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6 年第 3 期，第 100—110+158 页；周广肃、樊纲、申广军：《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4 年第 7 期，第 12—21+51+187 页。

的收入份额的比值”来衡量收入差距，^① Cobham 等将其称为“帕尔玛比值”。^② 这一比值的提出基于一个重要发现：对于正处于较快经济增长时期的经济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通常相对稳定，收入差距更多体现在收入分配分布中顶部 10% 和底部 40% 人群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收入差距指标测量的是其他部分，那么收入差距的变化将不易察觉。因此，这一指标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中主要变化部分的信息，更适合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经济体观察其自身收入差距现状。^③

本研究将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新进展的基础上，对国际组织、代表性经济体、研究型数据库对帕尔玛比值的实践应用进行梳理。相关分析显示，帕尔玛比值为国别收入差距分析提供了结构性视角，开启了洲际收入不平等的度量研究，进一步弥补了某一经济体内部收入差距统计测度指标的不足。基于其独特应用价值，本研究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

一、帕尔玛比值国际国内相关研究新进展

自“帕尔玛比值”概念提出后，国内外相关研究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国际方面，学界对帕尔玛比值认可度较高，既围绕其弥补基尼系数局限性开展延续性研究，也利用其测算本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托马斯·皮凯蒂（Tomas Piketty）亦将这一比值纳入自己所建数据库；国内方面，相关研究则大都集中于 2014 年，且以对其相对优势、测算方法及实证分析的研究为主。

（一）国际帕尔玛比值相关研究新进展

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进行检索，与帕尔玛比值相关的外文文献共 26 篇。^④ 从时间与频次来看，帕尔玛比值在提出初期影响力有限，但 2018 年后影响力显著上升，研究频次开始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从研究内容分布来看，使用帕尔玛比值的文献中高频关键词涉及“Economic Growth”（经济增长）、“Inequality”（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收入不平等）、“Financial Development”（金融发展）、“Sub-Saharan Africa”（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分别对应帕尔玛比值的理论论证及其在各领域、各地区的应用研究。

在理论论证方面，国外学者相继论证基尼系数的局限性，并认可帕尔玛比值的修正作用。2014 年，Palma 重新审视并验证了“50/50 命题”的国别同质性；^⑤ Cobham 等

① Palma J G, “Homogeneous Middles vs. Heterogeneous Tails, and the End of the ‘Inverted-U’: It’s All about the Share of the Rich”,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11, Vol.42, No.1, pp.87—153; Palma J G, “Has the Income Share of the Middle and Upper-Middle been Stable around the ‘50/50 Rule’, or Has It Converged towards That Level? The ‘Palma Ratio’ Revisited”,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14, Vol.45, No.6, pp.1416—1448.

② Cobham A, Schlögl L, Sumner A, “Inequality and the Tails: The Palma Proposition and Ratio”, in *Global Policy*, 2016, Vol.7, No.1, pp.25—36.

③ 苏京春、蒋震、郭金：《收入差距描述方法比较透视研究》，《发展研究》2020 年第 10 期，第 58—77 页。

④ 本研究以“Palma ratio”为关键词，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进行检索，截至 2025 年 6 月 4 日，共检索到 44 条记录，若将 2011 年首次提出帕尔玛比值的论文计入则共 45 篇。其中，与帕尔玛比值经济学本义有关的论文共计 26 篇。

⑤ Palma J G, “Has the Income Share of the Middle and Upper-Middle been Stable around the ‘50/50 Rule’, or Has It Converged towards That Level? The ‘Palma Ratio’ Revisited”,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14, Vol.45, No.6, pp.1416—1448.

则论证了基尼系数的局限性,支持 Palma 的论断并命名了“帕尔玛比值”这一指标,认为该比值更具政策相关性。^①此后,相关领域学者基于帕尔玛比值,广泛开展金融发展(Financial Development)、通信技术(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能源消耗(Energy Consumption)、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等因素与不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

此外,帕尔玛比值的学术研究影响力还体现在不同国家、地区基于其方法开展的测度分析中:既包括印度、^②欧盟、^③巴基斯坦^④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本国或本地区收入不平等开展的结构分析,也包括长期追踪研究非洲、亚洲等区域发展中国家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学者,基于该比值开展的相关研究。其中,长期致力于收入不平等研究的法国著名学者皮凯蒂,也将这一比值纳入其构建的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之中。

(二) 国内帕尔玛比值相关研究新进展

国内学界对于帕尔玛比值的引入、论证、延伸性研究以及应用性研究,均处于前期阶段。在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库以“帕尔玛比值”为关键词进行检索,^⑤2014—2021 年共检索到 7 篇文献,而若将检索范围拓展至全文,则共有 45 篇文献。综合来看,国内学者对帕尔玛比值的研究主要沿三条路径开展。

第一,对帕尔玛比值相对优势的研究。胡琳琳和高宇宁认为其相较于基尼系数更为直观,更易被政策制定者与公民理解,具有更强的政策相关性,在“减贫”议题下,对“提低”“限高”收入分配政策的提出更具参考价值。^⑥贾康等则指出,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的主要特征是贫富两极差距的结构性矛盾与总量性问题并存,而更能反映差距极化特征的帕尔玛比值,是测度该阶段收入差距的较为合适的指标,^⑦且能够反映社会收入结构中的主要变化部分,更利于中等收入国家认识自身收入差距。^⑧

第二,对帕尔玛比值的自主测算。张涛运用实证方法,对帕尔玛“50/50 法则”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并利用收入分组数据计算了 1985—2012 年我国的帕尔玛比值,

① Cobham A, Schlögl L, Sumner A, “Inequality and the Tails: The Palma Proposition and Ratio”, in *Global Policy*, 2016, Vol.7, No.1, pp.25—36.

② Das R, Srivastava R,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in India: A 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Analysis”, i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1, Vol.25, No.3, pp.1128—1149.

③ Farcomeni A, Geraci M, “Quantile Ratio Regression”, in *Statistics and Computing*, 2024, Vol.34, No.2, no.94.

④ Naveed T A, Gordon 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t the Household Level and the Measure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in Punjab (Pakistan)”, in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2024, Vol.25, No.3, pp.473—498.

⑤ 本研究以“帕尔玛比值”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至 2025 年 6 月 4 日,共检索到 12 条记录,排除 4 篇硕博论文及 1 篇特色期刊论文,仅摘取学术期刊库中的 7 篇文献进行分析。

⑥ 胡琳琳、高宇宁:《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新指标:帕尔玛比值》,《现代国企研究》2014 年第 12 期,第 104—105 页。

⑦ 贾康、苏京春、余乐:《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有效测度建模研究》,《财会月刊》2020 年第 23 期,第 116—123 页。

⑧ 苏京春、蒋震、郭金:《收入差距描述方法比较透视研究》,《发展研究》2020 年第 10 期,第 58—77 页。

将其作为新指标用于收入差距度量。^①

第三,引入帕尔玛比值作为收入差距变量开展实证分析。黄泽清和陈享光研究发现,垄断性国际资本与国内高收入群体结合后,会通过干预我国生产条件影响收入分配,短期国际资本则通过非生产性套利行为影响收入分配。^②该比值还被应用于教育学领域,通过测算学前教育经费的帕尔玛比值,发现省域间经费配置的两极分化严重,且农村省域间经费配置不均衡程度较城市更为严重。^③

由此可见,帕尔玛“50/50 法则”(即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相对稳定,而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变化更大)在我国具有较强可行性。同时,帕尔玛比值在衡量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方面比基尼系数更敏感,可有效矫正基尼系数对收入差距的低估问题,对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现实状况及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基于帕尔玛比值全球实践看其应用价值

自 2011 年提出以来,帕尔玛比值已较快进入国际组织及相关国家视野,并被纳入收入差距指标体系。国际组织、代表性经济体、研究型数据库对其实践应用表明,这一指标为国际组织开展国别收入差距分析提供了有效的结构性视角,为全球收入不平等研究提供了洲际收入不平等测算的可行路径,且能够有效弥补某一经济体内部收入差距统计测度指标的不足,在国际比较、洲际比较、国内比较方面均表现出独到应用价值。

(一) 为国别收入差距分析提供了结构性视角

自 2014 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在《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将帕尔玛比值纳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体系,^④与基尼系数形成补充,为国别收入差距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结构性视角,且该组织对帕尔玛比值的应用覆盖率仍在持续提升。具体来看,2014 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帕尔玛比值仅覆盖 104 个经济体,至 2025 年已扩展至 161 个经济体。

根据 Palma 的结论,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到印度、北非、俄罗斯、加勒比海地区,到中国香港、新加坡,再到位于北美地区的美国,最富 10% 人口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均能达到 1/3 左右,但通过帕尔玛比值可清晰识别,哪些国

① 张涛:《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原因分析:1985—2012 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 年第 12 期,第 3—22 页。

② 黄泽清、陈享光:《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各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变动——基于帕尔玛比值的分析》,《经济学动态》2018 年第 8 期,第 80—89 页。

③ 赵彦俊、刘敏慧:《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投入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和帕尔玛比值的考查》,《学前教育研究》2017 年第 8 期,第 35—45 页;蔡文伯、达选莹:《我国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投入的省域差异与成因》,《当代教育论坛》2022 年第 1 期,第 1—10 页。

④ 《人类发展报告》对帕尔玛比值的定义为:帕尔玛比值是指国民总收入中 10% 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份额与 40% 最贫穷人口的收入份额之比[英文原文为 Palma ratio: Ratio of the richest 10% of the population's share of 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divided by the poorest 40%'s share. It is based on the work of Palma(2011), who found that middle class incomes almost always account for about half of GNI and that the other half is split between the richest 10% and poorest 40%, though their shares vary considerably across countries.].数据来源: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fice, HDRO)基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计算得出。

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陷入了“赢者通吃”的局面。

由图 1 可见, 2012—2013 年、2015 年、2017—2018 年、2021—2023 年, 南非持续处于全球帕尔玛比值最高位, 其帕尔玛比值长期高于 7.0, 可见收入不平等程度并非如基尼系数所反映的那般温和: 最富 10% 人口的收入份额, 是中低收入群体 (后 40%) 收入份额的 7 倍以上, 贫富极化特征十分突出。金砖五国中, 巴西的帕尔玛比值也相对较高 (排名全球第 10 左右); 中国和俄罗斯的帕尔玛比值则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反映出最富 10% 人口的收入份额与中低收入群体 (后 40%) 的收入份额差距在缩小; 印度的帕尔玛比值则持续较低, 这一现象表明, 帕尔玛比值能对基尼系数形成有效补充, 但对于“非富即贫”、阶层固化的哑铃型社会结构所存在的贫富差距而言, 其与基尼系数类似, 同样存在失效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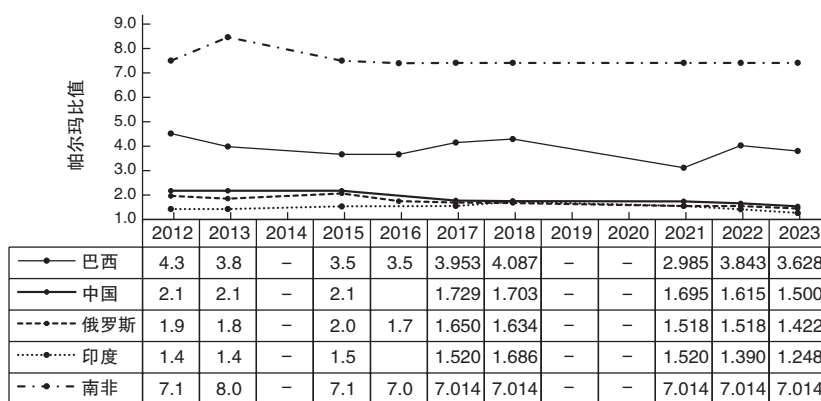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 UNDP 数据绘制的 2012—2023 年金砖五国帕尔玛比值对比

注: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需要说明的是, 2014 年、2016 年、2019 年、2020 年部分或全部经济体的帕尔玛比值数据存在缺失; 2016 年及之前的帕尔玛比值直接来源于《人类发展报告》, 数值精确至小数点后 1 位; 2016 年之后的帕尔玛比值, 系笔者根据该报告中提供的最贫穷 40% 人口与最富有 10% 人口的收入占比, 用后者除以前者自行计算得出, 数值精确至小数点后 3 位。

然而, 同一口径下, 发达国家的帕尔玛比值则表现得持续温和。例如: 英国 2021 年以 1.435 的帕尔玛比值位列全球第 85 位, 2022 年以 1.250 的帕尔玛比值位列全球第 111 位, 2023 年以 1.218 的帕尔玛比值位列全球第 114 位; 日本 2021 年以 1.288 的帕尔玛比值位列全球第 103 位, 2022 年以 1.288 的帕尔玛比值位列全球第 104 位, 2023 年以 1.255 的帕尔玛比值位列全球第 110 位; 德国 2021 年以 1.207 的帕尔玛比值位列全球第 116 位, 2022 年以 1.206 的帕尔玛比值位列全球第 117 位, 2023 年以 1.214 的帕尔玛比值位列全球第 115 位。

(二) 开启了洲际收入不平等的度量研究

全球收入不平等研究存在多个视角, 主流方法通常按地域将全球分组, 例如划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分析不同组别收入不平等驱动因素的差异时, 也常按大洲地理分布来开展研究, 进而得出洲际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结论。从现有研究来看, 洲际收入不平等研究往往也从洲际范畴内的国家收入不平等切入, 采用各国收入差距指标, 通过计算大洲内部国家间及国别内部的不平等差异, 整合得出洲际差距。

帕尔玛比值提出后, 相关研究者很快发现, 该指标不仅可用于单一经济体, 还可作

为大洲层面的测度指标，以反映大洲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已在“我们的数据世界”（Our World in Data, OWID）数据库中引入帕尔玛比值，该数据库不仅提供了多个经济体沿时间序列的帕尔玛比值数值，还计算了各大洲内部的帕尔玛比值，以便观测洲际收入差距。借助该数据库中 1980—2023 年的税前帕尔玛比值数据，^①可清晰观察到全球洲际收入差距变化的不同特征，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见，各大洲内部的帕尔玛比值差异显著，其中拉丁美洲的帕尔玛比值最高，2020 年甚至高达 17.838，最低值则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欧洲（1983 年，2.184）与北美洲（1980 年，2.503）。1980—2023 年，各大洲税前帕尔玛比值^②排名保持相对稳定，由高至低依次为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欧洲。2023 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的帕尔玛比值分别约为欧洲基准值的 4.45、3.21、2.52、2.17、1.79 倍，收入差距在洲际维度上呈现显著的非均衡特征。从极值来看，拉丁美洲帕尔玛比值最高值为 17.838（2020 年），最低值为 11.423（2014 年）；非洲最高值为 13.535（1985 年），最低值为 9.237（2020 年）；亚洲最高值为 9.604（1980 年），最低值为 7.447（1998 年）；大洋洲最高值为 6.609（2021 年），最低值为 3.340（1980 年）；北美洲最高值为 5.470（2016 年），最低值为 2.503（1980 年）；欧洲最高值为 3.435（2000 年），最低值为 2.184（1983 年）。其中，拉丁美洲帕尔玛比值波动区间最大，其次是非洲和亚洲，大洋洲、北美洲、欧洲的极差范围则明显收窄。从变化趋势来看，非洲、亚洲、欧洲的帕尔玛比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大洋洲、北美洲则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来看，各洲初次分配后的收入极化程度均较为明显，且随着经济的增长，若不采取适配的收入分配政策，收入差距先增后减的库茨涅兹“倒 U”形曲线并未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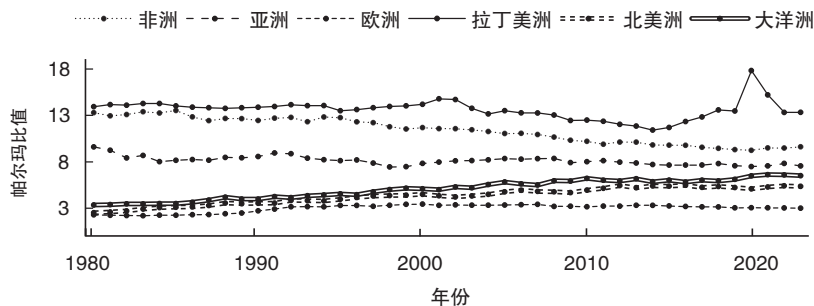


图 2 1980—2023 年各洲税前帕尔玛比值对比

注：曲线来源于 Our World in Data，数据来源于 WID 数据库。^③

① 该网站的帕尔玛比值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数据、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库（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数据计算得出。其中，1820—2013 年 244 个经济体的税前帕尔玛比值，基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基础数据建模计算得到；1963—2022 年 38 个经济体的税后帕尔玛比值，基于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库的基础数据建模计算得到。对于部分国家或地区，其帕尔玛比值或通过其他年份相关的数据推断得出，或基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观测数据建模得到。

② 本小节所述帕尔玛比值均利用税前收入计算得出。

③ “Income Inequality: Palma Ratio (before Tax), 1910 to 2023”,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palma-ratio-s90s40-ratio>.

（三）弥补了某一经济体内部收入差距统计测度指标的不足

巴西作为拉丁美洲主要的中等收入国家，常被视为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典型样本。巴西主要的官方统计机构之一——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nstituto Brasileiro de Geografia e Estatística, IBGE），详细公布了巴西 2012—2023 年全国、地区、州/联邦区及主要首府的帕尔玛比值，^①同时也公布了用于计算帕尔玛比值的家庭人均收入位于后 40%、中部 50% 及前 10% 的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

2012—2023 年，巴西全国及各地区帕尔玛比值的变动趋势如图 3 所示。巴西全国帕尔玛比值从 2012 年的 4.08 降至 2023 年的 3.60，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期间存在明显波动，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巴西东北地区的帕尔玛比值最高且人均收入最低，南部地区的帕尔玛比值最低且人均收入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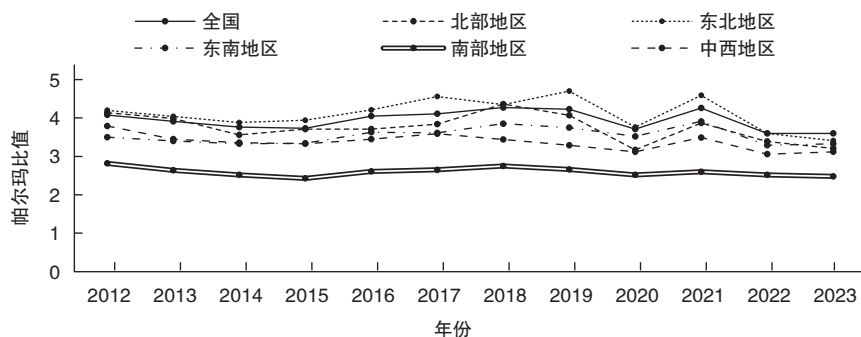


图 3 2012—2023 年巴西全国及各地区帕尔玛比值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

从时间维度观察，巴西全国帕尔玛比值在 2016 年出现显著反弹，该数值从 2015 年的 3.73 跃升至 2016 年的 4.05，随后于 2020 年迅速回落至 3.71，2021 年再次激增至 4.26，2022—2023 年维持在 3.60 水平。这些波动与巴西同期经济社会变革及政策调整紧密相关。2016 年特梅尔过渡政府执政期间，巴西经济严重衰退，GDP 增长率下滑，失业率上升，严重失业对收入份额位于后 40% 的群体造成显著影响，经济基本面恶化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失衡，最终体现为帕尔玛比值的显著上升。2018 年，博索纳罗政府缩减联邦政府规模、削减公共开支，并反对劳工党的高福利政策，财政紧缩政策与福利体系重构，在短期内对贫富两极群体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较大冲击，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成为帕尔玛比值波动的重要政策诱因之一。2020 年，巴西政府推出临时性的“紧急救助金计划”，帮扶贫困人群与因疫情失业的低收入群体，为其提供经济缓冲，该政策有效稳定了低收入家庭的基本收入，推动帕尔玛比值下降。然而，2021 年随着该政策的退出，低收入群体基本收入的不稳定性加大，成为帕尔玛比值反弹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社会扶贫项目推进与就业市场逐步改善的双重支撑下，巴西收入不平等程度在 2022 年降至 3.60，并在 2023 年维持这一水平。

① 依据巴西现行政区划，巴西全国可分为中西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

巴西全国帕尔玛比值随经济社会变革及政策的干预与退出,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效应,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的动态调节作用。巴西对各年度帕尔玛比值,以及收入位于后 40%、中部 50%、前 10% 人群的收入份额数据的统计与披露,有助于巴西政府准确观测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结构的动态变化,评估已有收入分配政策对高、中、低收入群体的针对性实施效果,并动态调整政策方向。

(四) 帕尔玛比值应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公布的帕尔玛比值,不难发现巴西本国与国际组织测算的数据存在一定出入:巴西本国统计测算值整体偏高,国际组织测算值则更加温和,如图 4 所示。

这种出入源自统计口径和测算方式的差异。从数据基础看,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采用全国连续房屋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统计单元,并严格遵循收入十等分分组标准;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通常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跨国可比数据,在数据不足时往往采用区域均值推断、样本权重调整等替代性方法,且部分测算仅涵盖核心收入项目,导致对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规模存在系统性低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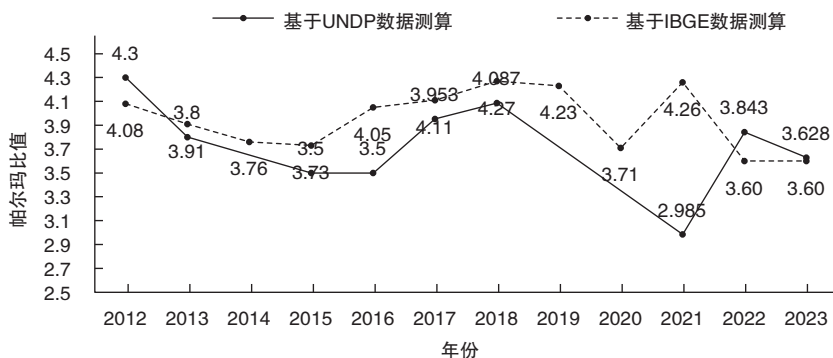


图 4 基于 UNDP 和 IBGE 来源的 2012—2023 年巴西帕尔玛比值对比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

三、进一步优化我国收入差距测度的对策建议

从收入差距的总量视角切入,往往是我们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首要视角。目前,我国研究收入差距的总量测度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一方面,基尼系数对收入差距主要来源群体的变化不敏感,易低估收入差距。从基尼系数的特性来看,即便不同经济体的基尼系数数值一致或相近,其收入分配结构也可能差异显著,对应的洛伦兹曲线形状也可能并不接近。另一方面,恩格尔系数作为通过观察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中食品支出占比,来判断贫富走势的指标,同样是典型的总量指标,虽能较好反映某一国家整体是更趋于富裕还是趋于贫穷,却无法体现结构性变化。若能够引入帕尔玛比值这一结构性指标,则可直接观察最富 10% 与中底部 40% 群体的收入分配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动态变化,提供一个高效的收入差距测度视角,便于在政策层面更精准有效地构建“增

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

我国当前统计数据更多聚焦于全国居民收入五等分分组,尚未完全公开十等分数据,缺乏支撑帕尔玛比值测算研究的基础数据。如前文所述,多数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及部分金砖国家统计机构均定期公布家庭或居民收入十等分与五等分的完整数据,部分国家除披露税收及转移支付前后的收入分组数据外,还会细化呈现扣除相关项目后的收入、转移支付率及构成等信息,为利用多维数据直观反映国内收入分配状况及社会结构提供了数据基础。对我国而言,可先考虑延长五等分数据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逐年公布全国及城乡收入十等分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延长五等分数据时间序列并进一步完善十等分数据,可为我国帕尔玛比值测算提供良好基础。实际上,即使我国未能建立专门数据库测算该比值,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最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及金砖五国核心成员国,我国本身也符合全球收入不平等高度关注的特征,且满足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帕尔玛比值等指标的应用条件,国际组织也会披露我国在这方面的具体数值。正如前文所述,主要国际组织与学者群体已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建立相关数据库,并计算披露了对应的帕尔玛比值结果,但国际组织披露值与国内测算值可能因为统计口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无论是偏高还是偏低,均会导致对“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对冲政策存在偏差。若我国拥有自主可靠的统计数据,则能更好地提升政策精准度。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Palma Ratio and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China

SU Jingchun, ZHANG Yan

Abstract: Existing income gap measurement indicators have limitations to varying degrees. Starting from these limit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ive supplementary role of the Palma Ratio in addressing the aforementioned limitations at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Based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presentative economies, and research databas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alma Ratio provides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for national income gap analysis, supports the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 of global intercontinent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lps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indicators for income gaps within a single economy.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optimiz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Palma Ratio calculation system in China, starting with improving the basic data on income quintiles and deciles.

Keywords: Palma Ratio; income gap; income distribution

(责任编辑:李 玲)

【论点摘编】

经济学动态 2025年第3期 林木西、王聪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 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现代化体系建设，围绕现代化体系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重要原则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从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实践指向及价值意蕴等维度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从而更好推进新时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年第8期 韩喜平 《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中国式现代化》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刻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中国共产党在开拓、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推进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与变革，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国际关系，明确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平等与公平正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追求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先进本质。

求是学刊 2025年第4期 齐兰、王晨、马琳琳 《数字金融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研究》 基于大语言模型测算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论如下：一是数字金融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变换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二是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金融对东中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锦上添花”效应，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存在“资源倾斜”，对成长期企业则发挥了“启动资金”作用；三是机制检验显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缓解信息约束、优化资本配置和激发消费需求效应，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四是溢出效应检验显示，数字金融通过促进焦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对产业链上游企业的溢出效应。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管理学报 2025年第4期 刘柳青、杨白冰、杨青龙 《营商环境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指出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力量，其发展对于培育新兴经济动力和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以2017—2022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综合区域经济数据、企业财务数据与年报文本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系统考察区域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区域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区域营商环境的宏观改善能够作用于民营企业的管理层语调，进而将这种正面效应传递到微观层面，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在“双循环”格局中，该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对内需的提振作用，即促进“国内大循环”。由此揭示出构建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催生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意义。

财贸经济 2025年第8期 郭克莎、蔡煜 《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探讨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主

要包括理论上的形成动因、特质创新和基本内容，实践中的问题挑战、测度方法和战略取向。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下一阶段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探索，要加强对新质生产力理论形成规律特点的科学把握，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把握好新质生产力与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动态关系，坚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推动生产关系的调整完善；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要积极研究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坚持引导各地方各部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坚持在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风险投资和耐心资本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坚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财贸经济 2025 年第 8 期 汪旭晖、张其林、卢星彤、张建军 《数字产业集群的理论体系构建：内涵、动力、模式与路径》 指出不同于传统产业集群在地理空间的集聚，数字产业集群是在虚拟空间集聚，导致既有的产业集群理论难以解释和指导数字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为此，本文对于数字产业集群的理论内涵、内生动力、集聚模式与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的厘定。具体来说，文章将数字产业集群定义为在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在网络平台上高度集中的企业集合。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于传统产业集群的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供给侧规模经济，数字产业集群的内生动力主要源于需求侧规模经济。这种内生动力使得数字产业集群的集聚模式呈现为共享式集聚、协作式集聚、拓展式集聚、共生式集聚的互嵌与融合，发展路径历经平台驱动形成初始产业集群、市场驱动促成产业集群扩张、场景驱动促进产业集群融合的复杂过程。文章对数字产业集群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释，为构建数字产业集群理论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先导基础，也有望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贡献可行的政策建议。

华东经济管理 2025 年第 9 期 梁孝成、吕康银、陈思 《数据资产如何赋能企业韧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指出数据资产作为企业重要的新型战略资产，对于赋能企业韧性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使用 2011—2023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据资产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据资产可以显著提升企业韧性。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据资产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促使企业韧性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数字化程度较高企业、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中，数据资产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效果更大。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5 期 赵晓航、李建新 《老年人数字行为的变迁机制与分化逻辑——基于 2016—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动态分析》 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银发数字鸿沟”不断缩小。利用 2016—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上升和使用模式变迁的驱动机制，并考察多种因素对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模式影响的时期变化。研究发现：（1）资源禀赋（物质、认知、社会资源）与机会背景（区县互联网普及率）的改善提高了老年人数字接入率。（2）老年网民结构日益分化，浅层与深度用户并存，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的变化共同推动了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变迁。（3）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对老年人数字行为的影响持续增强，老年群体内部的数字鸿沟逐渐显现。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包容型社会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责任编辑：陈 彬）